

## 农地征地补偿改革为新型城镇化铺路

□民族证券 陈伟

租高，因此能承担更高的补偿标准，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则难以承受较高的标准。

因此更合适的方法是赋予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用地交易主体的地位，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十八大报告指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意味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权，将是未来几年的发展目标。

## 农民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现行土地管理法是2004年修订的，其中对于农地的补偿标准过低，如第47条指出：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在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引发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之际，全国土地平均出让价格从2004年的329元/平方米上升到2011年的943元/平方米。

由于农作物价格增速严重滞后，2004—2011年粮食价格上涨已上涨56%，农民从土地征收中获得的利益也就更加微薄。按照2011年的水平，农民平均的补偿标准只有26元/平方米，在征地收益中获得比例只有3%左右，这也使得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速严重滞后。

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仅从2004年的1.9%上升至2011年的2.3%，远小于城镇居民的改善程度，后者比例从2004年的1.6%上升至2011年的2.7%。这也拉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抑制了我国扩大内需。

如果将土地征收标准提高10倍，意味着若以2011年我国土地出让金额31500亿元为例，农民将多增加7800亿元，农民年均收入多增加1157元，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也将从目前的3.4倍大幅下降至2.9倍，城乡收入分配也会更加公平，有利于提振目前疲软的内需。

## 土地改革还需继续深化

当然，仅将征地补偿数额提高也仍是权宜之计，应该看到，即使在征地补偿数额提高后，也仍然会存在以下问题：由于仍是地方政府主导土地征收，农民在此过程中仍处于被动地位，权益也容易受到侵犯；农民补偿大幅增加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征地成本，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成本，就更有动力推高土地价格，这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也会进一步加大城市的成本；统一的补偿标准难以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如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土地级差地

## 页岩气开发不可忽视环境因素

□新华都商学院 林伯强

页岩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全球储量达到456万亿立方米，比常规天然气储量多78万亿美元。相比煤炭、石油而言，页岩气燃烧过程更为清洁且排放更少，因此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

美国是世界上页岩气开发最为成功的国家。如果较真，美国页岩气的开发可以追溯到1821年，但近十年水平井及水力压裂等核心技术的运用普及，才使得美国页岩气开发得到真正提速，并且得到好处。得益于这些开发技术的突破，到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到1379亿立方米，占全美天然气年总产量的23%，超过中国天然气年总产量；2011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超过1800亿立方米，占比更是达到34%。页岩气的开发大幅度降低了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提高了能源的自给率，改善了能源的供给格局。美国页岩气开发取得的成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页岩气开采利用的高度关注。

但是，人们在关注美国成功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美国页岩气开采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2011年，美国最热门的环境问题是关于水力压裂法开采页岩气对环境的破坏。某些地区的页岩气井因环境问题已暂时关闭。美国各界在调查马塞拉斯(Marcellus)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发现，页岩气的开发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也对当地水体、大气等生态环境造成了新的威胁。

因此，页岩气开发好处很多，隐患似乎也不小。页岩气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我们需要在发展的初始，就思考其发展的相关问题，避免重蹈其他资源性产品发展中的教训。

## 加快电价市场化 理顺煤电价格矛盾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 马涛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关于取消重点合同，推进电煤价格并轨》报告已上报国务院，如果报告获批，重点电煤将与市场煤价格并轨，煤电双方实现自主订货，国内电煤价格将首次实现完全市场化。这也意味着，历时20年的电煤价格双轨制和历时几十年的煤炭订货会从2013年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煤电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自实行市场价格改革以来，由于电力市场改革方案与电煤市场改革方案不配套，二者在电煤交易环节一直存在着矛盾。1993年，我国对煤炭价格实行市场化，但政府对国有大型电厂的电煤价格仍进行控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锁定一年供应量，以确保涉及千家万户的电价稳定，从而形成电煤的重点合同价与市场价并存的电煤价格双轨制，成为煤电双方多年矛盾的焦点，而且还滋生了倒卖寻租等问题。相对于电煤市场，我国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更加滞后。经过十多年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我国电力市场只实现厂网分离，未能真正实现竞价上网，输配电价以及居民销售电价仍由政府管制，电网企业无法根据市场供需和成本变动因素自行调整价格。

2002年煤炭市场转为卖方市场以后，电煤价格冲突日趋激化。从2011年数据

看，我国火电厂需要至少12.5亿吨标准煤，而国家发改委规定的3.8亿吨重点电煤合同与之相差8.7亿吨，电煤缺口至少占需求总量的69.6%。为抹平电煤缺口，五大电力集团每年购进市场煤的比例至少在6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电力企业对电煤价格的放开比较抵触。如果取消重点电煤合同，电煤价格上涨，发电企业生产成本加大而上网电价维持不变，难以承受高成本的发电企业存煤量下降而导致电力供应紧张甚至出现缺口。因此，电煤价格实际上“放而不开”，在每年煤炭订货会上，国家发改委仍对重点合同电煤批发参考价，电煤价格完全市场化进程遭遇搁浅。

2012年，随着煤炭“黄金十年”的终结，急剧增加的煤炭库存、急剧下滑的煤炭价格、急剧恶化的煤炭市场形势，为电煤价格并轨提供了机遇。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煤炭生产、运输、消费增幅回落，库存上升，价格下降，市场由年初的基本平衡转向总体宽松。今年1—9月，煤炭生产平稳增长，铁路煤炭发运16.8亿吨，同比下降0.1%；主要港口煤炭发运4.6亿吨，下降6.4%。煤炭消费增幅明显回落，其中火电行业耗煤回落12.3个百分点。9月末，全社会煤炭库存2.87亿吨，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主要港口存煤4076万吨，同比增长53%；煤炭企业库存9800万吨，同比增长70%。

但是电煤价格双轨制不是煤电冲突的

根源。在电价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电价不能自由浮动的情况下，煤电冲突不会因电价并轨而彻底消除。价格并轨可以实现电煤的完全市场化定价，是在局部环节上对当前煤炭价值链进行再造，仅能起到治标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煤电联动机制无法为电力与电煤同步市场化提供必要的利益保障和制度性框架。由于电力和电煤在市场化进程中没有同步实施，电煤市场化和电力价格计划管理只会使两者矛盾越来越突出。据中国煤炭工业发展中心预测，我国已经从煤炭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未来15年内，煤炭仍将是基础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70%左右，煤炭供应缺口仍将增加，2020年约为10亿吨。随着电煤价格的上涨，电力行业的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煤电冲突将不断升级。

煤电冲突是由于电力价格市场化没有跟上煤炭价格市场化造成的，电力市场与电煤市场在衔接上脱节，存在市场机制不协同、市场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与电煤价格矛盾，只能通过理顺电力与电煤市场机制，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步伐，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加快电价市场化改革进程，早日使煤电上下游能形成市场化改革步伐协调一致，实现电力与电煤市场协同发展。

电煤价格并轨最终需要煤电联动配套。为了解决电煤价格双轨制下煤企和电企的纵向交易机制的不足，国家发改委曾

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建立煤电联动机制的意见的通知》，规定在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内（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若平均煤价比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相应调整电价，其中煤价涨幅的70%由电价来补偿，其余30%由发电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来承担。但是这一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联动不及时和联动幅度不到位，致使电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电力供应一度不足的局面，煤电联动机制亟待完善。

电煤价格并轨不失为煤电联动的倒逼机制，煤电联动将成为国内企业的主要诉求。完善煤电联动机制，应清晰明确煤电联动的触发启动点，加快形成客观反映国内市场实际到厂煤炭价格指数，降低发电企业自行消化煤价上涨比例，在电煤价格涨幅超过一定幅度的情况下，同步实行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联动。此外，要大力铺开直购试点，并小范围展开输配电价制定及竞价上网试点工作。

市场化改革是煤电协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市场建设不可能靠自己形成并自我维持，需要根据市场特点进行严格的市场设计与适度的监管。为此，政府必须痛下决心，打破垄断，扫清煤炭、电力行业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如果完全依赖煤电联动机制，总是在不开放市场的前提下提高电价，电力行业将被锁死在管理和技术改革低效率的路径上。

## “中产阶级危机”是全球经济困顿之源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张茉楠

曾经是发达国家发展动力的中产阶级正步入“衰落十年”。近些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不断加剧，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产阶级的冲击最大。

中产阶级崛起曾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800年以来，全球中产阶级共出现三次爆炸性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在1820年至1913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从基本停滞发展到大约每年1%的水平。在此期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从1820年的1.8%增长到1913年的13.2%。在1913年到1950年期间，由于两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产阶级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第二次中产阶级爆炸性增长发生在战后，1950年至1980年期间，中产阶级人口从23.5%增长到32.2%。第三次中产阶级的爆炸性增长发生在1990年之后，从1990年的34.2%，即约为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增长到2006年的50.2%，超过一半世界人口。

然而这种趋势近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不断加剧，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崩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二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收入增长放缓，资产严重缩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1979年到2009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增长了13%，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研究还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个人资产比其收入缩水程度更大。1971年至2011年，中产阶级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5%，但同期净资产中位数则由近13万美元下降至9.3万美元，降幅达28%，资产缩水将近三成。

另一方面，美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结果显示，1%的富人拥有财富的40%；1%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4%；1%的富人占有50%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而50%的中产阶级只占0.5%。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更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

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10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资产持续缩水，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式微，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这样的社会结构必然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

因此，全球经济困顿的背后并非刺激政策不够，而是在于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如果不拯救中产阶级，全球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复苏。